

# 要素禀赋和分配机制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杜玉申 张屹山 王广亮

**摘要** 中国近年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持续下降主要是大范围实施二次分配政策的结果。随着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二次分配政策的实施将受到约束，探讨在初次分配领域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合已有理论，本文提出，个人收入取决于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和各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而各种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又取决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企业契约发起机制。数理模型分析支持上述理论框架，数值模拟结果进一步显示，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形成类似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模式，增加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弱于减小要素禀赋不平等。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针对中国目前的初次分配体制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 初次分配 要素禀赋 分配机制 讨价还价 收入差距

作者杜玉申，吉林大学商学院、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张屹山，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王广亮，吉林大学商学院、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8-0053-16

##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出一个先升后降的形态，即从2003年的0.479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0.491而后逐年下降，2015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2016年略有回升为0.465）。这一先升后降的形态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种形态可能意味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越过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拐点进入了下降通道。按照库氏假说，随着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持续进行，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并最终回归到一个合意的水平。然而这种良好的愿望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是否存在着统计数据和方法方面的误差；二是前述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是否如库氏理论所说是单纯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结果。

杨耀武和杨澄宇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历史数据回溯调整方法，对CHIPS（2007）微观家庭数据进行了调整，并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了点估计。在此基础上使用自助法（bootstrap）对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点估计的标准误差进行了估计，构造了相应的基尼系数置信区间。结果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2013年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5次连续下降中，只有3次是统计显著的。<sup>①</sup>由此看来，断言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进入下行通道还为时过早。

<sup>①</sup> 杨耀武、杨澄宇：《中国基尼系数是否真的下降了？——基于微观数据的基尼系数区间估计》，《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朱高林和邢立维系统梳理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各种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包括: (1) 减轻农民生产生活负担, 如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生产补贴; (2) 织密社会保障网, 如实施医疗保险全覆盖、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4)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5) 加大收入分配调控力度, 包括调整个税起征点和税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sup>①</sup> 在以上措施中, 除了最低工资制度和就业优先战略着眼于初次分配, 扶贫攻坚部分地借助于初次分配力量外 (仍涉及大量的财政投入和税收减免), 其余措施均属于二次分配政策, 也就是说, 2008 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再分配政策的结果。实施这些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中高速 (而非高速) 增长成为新常态,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必将受到制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 2011—2015 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 25.0%、12.9%、10.2%、8.6%、5.8%, 顺次递减的增速似乎也证实了上述担忧的合理性。

居民收入差距是初次分配造成的, 虽然二次分配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差距, 但这不仅需要政府强大的财政力量来支撑, 同时也会削弱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因此,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初次分配过程中导致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首先回顾关于初次分配影响因素的理论和观点, 然后提出一个考虑个人 (家庭) 要素禀赋和收入分配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 基于数理模型论证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扩展我们对初次分配的认识, 最后提出初次分配阶段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主张。

## 二、文献回顾

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的考察经历了一个从要素收入分配到个人收入分配再到个人—要素收入分配综合分析的过程。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视角观察和解释国民收入的分配, 即总产出如何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一研究范式的延续如此深入和广泛, 以至于卡尔多 (Kaldor) 发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长期稳定。<sup>②</sup> 然而, 要素收入份额 “长期稳定” 的事实并不能掩盖个人收入分配变化的趋势。库兹涅茨 (Kuznets) 首先注意到英国 (从 1880 年到 1947 年) 和美国 (从 1929 年到 1950 年) 个人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的现象, 结合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提出了个人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 “倒 U 形” 变化的假说。受 “倒 U 形” 假说的启发, 此后的收入分配研究主要是从个人收入分配视角展开的, 例如, 鲍克特 (Paukert)、阿鲁瓦莉娅 (Ahluwalia) 基于多国数据的分析肯定了 “倒 U 形” 假说,<sup>③</sup> 而波基恩和梅瑞森 (Bourguignon & Morrisson) 在改进了数据的可比性后则没有发现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sup>④</sup> 这似乎意味着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化并非经济增长单一变量能够完美解释的。

皮凯蒂和塞茨 (Piketty & Saez) 根据个人纳税数据分析了 1913—1998 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的收入份额变化, 显示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三十年收入相对平等的 “黄金时期” 后, 个人收入差距再度加大, 而且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 工资收入和自我雇佣收入 (指小企业主、合伙业者的收入) 超过资本收入成为主要来源。<sup>⑤</sup> 这一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再次研究要素收入分配的兴趣, 但是这一次研究主题的转移不是简单地回归李嘉图框架, 而是试图建立起个人收入分配与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这一努力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方向: 一是用个人要素禀赋加上要素收入份额来解释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二是解释技术进步如何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化以及劳动要素内部的收入分化。

道迪和加西亚—佩纳罗萨 (Daudey & Garcia-Penalosa) 指出, 个人收入既取决于其要素禀赋又取决于这

① 朱高林、邢立维:《新常态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变化》,《上海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1 期。

② Kaldor, 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7, 67(268), pp. 591—624.

③ Paukert, F.,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Survey of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973, 108(2—3), pp. 97—125; Ahluwalia, M. S., “Inequa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6, 3(4), pp. 307—342.

④ Bourguignon, F., Morrisson, C.,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Dualis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7(2), pp. 233—257.

⑤ Piketty, T., Saez, 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pp. 1—39.

些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因为资本要素的人际分布通常比劳动禀赋的人际分布更不平等,所以当资本的份额超过劳动的份额时个人收入差距将会加大。<sup>①</sup>郭庆旺和吕冰洋更严谨地表达了上述逻辑。他们基于道迪和加西亚-佩纳罗萨的模型推导出  $\sigma_y = S_L \text{gcov}(y_i, \omega_i) + S_K \text{gcov}(y_i, k_i)$ , 其中  $\sigma_y$  是个人收入的方差, 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总体情况;  $S_L$  和  $S_K$  分别是劳动和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  $\text{cov}(y_i, \omega_i)$  和  $\text{cov}(y_i, k_i)$  分别是个人收入与其相对工资和相对资本的协方差, 代表个人收入受劳动禀赋和资本禀赋影响的程度。该关系式表明, 当个人收入主要受资本收入影响时, 减小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有助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然而, 为了找到干预要素收入份额的政策切入点,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背后力量。

技术进步偏向性理论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希克斯(Hicks)在其著名的《工资理论》中提出,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刺激技术创新向着节约昂贵要素的方向发展。Kennedy 则认为, 是“创新可能性边界”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方向。<sup>②</sup>上述理论分别强调技术进步的方向受技术需求或技术供给因素的影响, 而埃塞莫格鲁(Acemoglu)则构建了一个综合模型, 证明技术进步的方向同时受最终消费者偏好、要素供给和要素间替代弹性的影响。<sup>③</sup>尽管不同研究者的分析框架有所区别, 但他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技术进步偏向性改变了要素的边际生产能力, 从而改变了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

皮凯蒂和塞茨(Piketty & Saez)在分析了20世纪以来美国高收入群体的工资份额后认为, 工资份额的突升或突降很难仅仅用技术进步来解释, 它们与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财政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sup>④</sup>卡特(Card)等在分析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近三十年来的工资收入情况后得出结论, 去工会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工资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sup>⑤</sup>

从初次分配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 个人的要素禀赋(拥有何种要素及构成比例)、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能力、以及初次分配的体制或机制都是影响个人收入份额的因素。如果要比较全面系统地解释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 则需要构建一个同时考虑上述三类因素的理论框架。

### 三、资源禀赋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 (一) 生产要素内容的历史演变

新古典的分配理论简单地将要素类型限制在劳动与资本两个维度, 因而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也主要关注劳动与资本所得份额的变化。从长期来看, 生产要素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农耕时代, 生产要素由劳动、土地两大要素构成; 到工业社会初期, 形成了劳动+土地+资本的生产要素组合; 再到工业社会中后期, 生产要素表现为劳动+土地+资本+管理的四要素结构;<sup>⑥</sup>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 技术、知识、信息等又成了生产要素组合中的新成员。在要素内容越来越丰富的同时, 每一种要素内部也在发生着分化, 例如, 资本分化为低技术资本与高技术资本, 劳动分化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

与要素内容丰富化过程相伴的, 是个人拥有的要素组合越来越复杂, 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种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货币、知识), 通过多种方式(工资、地租、利息、版税)参与分配。抛开分配机制不谈, 在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中, 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份额既取决于其拥有哪些生产要素, 又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每一种要素的边际贡献能力, 或者说要素的异质性。

#### (二) 物质资本异质化与人力资本异质化

在国民经济统计理论中, 初次收入被划分为企业利润和工资(以及政府税收), 前者代表物质资本所有

① Daudey, E., Garcia-Penalosa, C.,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43(5), pp. 812—829.

② Kennedy, C., "Induced Bias in Innovation and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Economic Journal*, 1964, 74(295), pp. 541—547.

③ 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4), pp. 781—809.

④ Piketty, T., Saez, 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pp. 1—39.

⑤ Card, D., Lemieux, T., Riddell, W. C., "Unions and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004, 25(4), pp. 519—562.

⑥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朱志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年, 第352—374页。

者的收入,后者代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掩盖了个人资源禀赋,即个人所拥有的要素组合以及每一要素的异质性对初次分配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技术与管理两个关键要素的剖析得以重现。

### 1. 技术要素的赋存状态。

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依附在传统要素之上,通过提升传统要素的效率进而增加产出。具体表现在:(1)依附于物质资本中的科学技术,具体形式表现为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性能更优良的材料;(2)依附于人力资本中的科学技术,具体形式表现为劳动者知识和技能;(3)作为先进工艺和方法存在的科学技术,这类技术的直接表现形式是作为文档信息存在的专利、专有工艺、专有配方。从形式上看,它们独立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从产权归属关系来看,它们通常以企业无形资产的方式归股东所有,也就是说,作为先进工艺和方法的科学技术仍然依附于物质资本而存在。

同样数量的物质资本,因其融入的技术含量多少而表现出不同的边际产出能力,物质资本产出能力的增加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贡献。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已不再是简单的工厂和矿山规模,它实际上是传统资本概念和技术要素的综合体。拥有高技术含量的资本比拥有一般技术含量的资本更能带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力。

同样数量的劳动,因其融入的知识和技能多少而表现出不同的边际产出能力,劳动产出能力的增加实际上是知识和技能要素的贡献。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已不再是工作时间所能度量的,它实际上是传统的劳动概念与知识技能的综合体。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比简单劳动更能带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力。

### 2. 管理要素的赋存状态。

分工的细化引出了协调经济活动的必要性,管理的本质就是协调不同主体的经济活动。马歇尔在著名的“微分—积分”论断中指出:“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细部分增加(微分);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积分)。……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企业中,指导生产活动以有效满足人类需求的任务分离出来,转移到了专业雇员,或者更一般地称为企业家的人的手中。”<sup>①</sup>从马歇尔明确提出生产组织(或管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至今已经一百多年,劳动分工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出那个时代。从深度上说,流水线上的每个工人只负责一道工序甚至一道工序的某个特定动作;从广度上说,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已经形成。协调分工经济的任务日益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管理者已经从早期的私营企业主分化为一个多层次的委托代理体系。管理者或者说企业家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劳动者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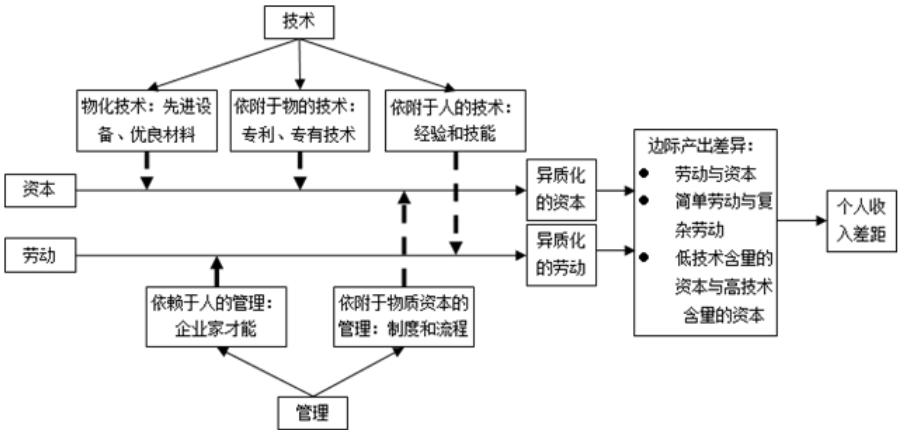
作为生产要素的管理知识主要赋存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中,增加了企业家在初次分配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管理知识还在一定程度上以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的方式固化于企业的管理系统之中,这种固化的知识虽然不能以货币计价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但它们连同企业的有形资产一起归股东所有,并能为股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 (三) 要素异质化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日益复杂化以及分工日益细化的当今时代,技术可能以复杂设备或高性能材料方式存在于物质资本中,或以专利、专有技术的形式归股东所有;也可能以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形式存在于人力资本中。管理知识可能以制度和流程的方式归企业股东掌握;也可能以企业家才能的方式存在于人力资本中。技术和管理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相结合,引起了传统要素的异质化,个人因其拥有的要素(物质或人力)组合不同,或因其某种要素的异质性,便拥有了不同产出能力,进而形成了初次分配中的讨价还价力并最终影响其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图1)。

<sup>①</sup>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299—300页。

图 1 要素异质化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 四、分配机制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主流经济学假定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这种条件下初次分配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进行。只要不同社会成员的资源禀赋相差不大，就可以将收入差距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机制并不会像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完美，社会成员的资源禀赋也可能相差很大。上一节分析了资源禀赋差异及其对初次分配的影响，本节转向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 （一）资源相对稀缺性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完全竞争要素市场的价格模型并未考虑资源约束问题，意愿的供给和需求可以随着价格的变化无限地增加或减少。但真实的情况是，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存在着刚性或黏性。在生产技术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可能达到或接近其供给上限，从而导致该种要素价格快速上涨，要素所有者在短期内聚敛大量财富。这并非是偶然的极端现象，它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重复出现，甚至构成了近两百年来财富分配演化史的基调。

19 世纪初，随着人口和生产的持续增长，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土地价格和地租快速上涨，这导致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稀缺性原理”。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地主攫取了国民总产出的大部分而留给其他阶层的份额越来越少，这将最终破坏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因此他主张国家应该稳步地提高地租税（二次分配）。当然，财富分配失衡最后并没有达到李嘉图所预测的灾难性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解决了人类的给养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所有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是不争的事实。<sup>①</sup>

到了 19 世纪中叶，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供给过剩的要素，相对而言资本成为稀缺的要素。要素相对稀缺性让资本相对于劳动拥有了极大的讨价还价力，在这种背景下，工人的工作时间之长、报酬之低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sup>②</sup> 这直接导致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高份额状态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及战后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这一段收入分配演化史常被用来证明库兹涅兹“倒 U 形”假说的合理性。现在看来，所谓经济增长减小贫富差距可能不是一种终极趋势，而只是从一种形态的贫富差距向另一种形态的贫富差距过渡的间奏。

在经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所谓的“黄金三十年”后，巨大的贫富差距又一次出现。不过导致这一次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资本收入份额过高，而是由于工资收入，特别是大公司高管和技术精英阶层的收入大幅度增长所致。<sup>③</sup>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就了完备的资

①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中国城市化之初大量农民工进城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欧洲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③ Jones, C. I., “Pareto and Piketty: The Macroeconomics of Top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29(1), pp. 29—46.

本市场,完备的资本市场导致资本供给充足,同时也导致资本所有者分散化,失去了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讨价还价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技术日益复杂化使得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成为稀缺的资源,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成为控制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资本所有者从“剥削者”变成需要保护的对象。<sup>①</sup>实际上,很难从经济计量的角度来分析人力资本收入份额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其边际贡献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其稀缺性,这两个方面是相得益彰的,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力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讨价还价力增大。

### (二) 企业契约订立过程对初次分配的影响

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是一个要素的集合体,各种要素协作创造产出,再依据要素的市场价格或边际贡献分配产出价值。这是一个极度抽象的模型,既没有关于要素所有者目标函数的假设,也没有关于参与者之间互动过程的描述。全部分配过程由一个代表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抽象决策者通过决定劳动和资本的雇佣数量来完成,而这个决策者既不是作为企业股东的资本所有者,也不是作为经营者的经理人,更不是一般劳动者,他们都是抽象决策者的雇佣对象。由于没有揭示任何关于契约订立过程和产出分配过程的细节,因而也就无法探讨过程性因素对产出分配的影响。现实中的企业总是以某种要素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在古典企业中,资本所有者购买土地、建设厂房、购置机器设备、招募工人、组织生产,他们是企业契约的核心;在现代企业中,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寻找适用技术、募集货币资本、招聘工人,制定生产经营计划并组织实施,企业家处于企业契约的核心地位;在日益兴起的创新驱动型企业中,技术发明者展示自己成果的市场前景,吸引风险投资,雇佣职业经理人,而自身在完成企业组建后或成为股东,或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企业。

企业契约发起人的变化意味着讨价还价过程的变化和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在古典企业中,资本所有者是企业契约的提议人,该契约规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的主体作用表现为接受或拒绝契约。作为契约的提议者,资方占据了先动优势,他所提议的给予劳动者的份额不会超过劳动力市场的保留收益。当然,不能否认资方承担了市场风险,因而有学者认为资本收益的本质是风险回报,<sup>②</sup>但问题在于,资本所有者仅在有限程度上承担市场风险,当企业因市场剧烈变化而不得不压缩规模时,劳动者首当其冲成为被裁减的对象;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是企业契约的提议人,该契约规定了股东、经理人和普通员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为非提议者,股东和普通员工的主体地位表现为接受或拒绝契约。物质资本的作价由资本市场给出,而普通员工的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唯独企业家的报酬没有完备市场作为定价依据。实际上,企业家在提议的契约中不仅为自己制定了工资标准、股权比例,还为自己保留了最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剩余控制权。委托代理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企业家“剥削资本家”的问题。遗憾的是,委托代理理论假设股东是企业契约的提议者,这完全脱离了真实的企业契约订立过程。在真实的企业中企业家才是契约提议人,谁作为契约提议人,谁就控制了收益分配的主动权;在创新驱动型企业中,技术发明人热切地向风险投资者介绍自己成果的市场前景,而一旦风险投资家们被潜在的投资收益所吸引,技术发明人便会提出技术入股比例、董事会构成比例(剩余控制权配置),风险投资人的权力表现为是否接受这个提议,表面上看起来双方是平等的,甚至是技术在寻求资本的合作,而实际上在一个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资本四处寻找机会的时代,真正有前景的技术从来不用担心谈判的破裂。至于职业经理人和实际从事生产的一般劳动者,则通常只是为了谋求一份参照市场价格的收入而加入要素间合作。

### (三) 要素定价的统一行动与分散行动

垄断产品市场理论表明,当垄断厂商拥有自主决定产品价格的权力时,他可以通过制定产品价格操控产品需求量进而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产品市场的权力逻辑同样适用于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的是,定价人不再是垄断产品的厂商,而是企业契约的组织者,即古典企业中的企业主、现代企业中的企业家或

① 张屹山、杜玉申、王广亮:《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与企业绩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② 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郭武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技术创新型企业中的技术发明者。价格接受者也不再是商品消费者，而是企业契约的被动参与者，即古典企业中的劳动者、现代企业中的股东和普通工人、创新驱动型企业中的风险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及普通劳动者。契约组织者作为一个统一行动者，可以通过制定要素价格来操控要素供给量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论该组织者制定出一个什么样的要素价格，总有一部分要素供给者会接受，即使有一部分要素供给者拒绝合作，契约组织者仅仅损失边际处的产量；但对于分散行动的要素供给者来说，一旦拒绝合作，将失去整个合作机会。在这种情形下，契约组织者可以从容地计算让多少要素供给者接受其出价对其最为有利。

对于上述分析逻辑的一个可能的质疑是，当要素供给者拒绝与契约组织者合作时，他可以寻求与其他契约组织者合作，因此不会失去全部机会。但问题在于，契约组织者的数量总是少于要素供给者的数量，契约组织者的选择空间总是大于要素供给者的选择空间。从根本上说，契约组织者代表了一个合作机会，而要素供给者仅仅是机会利用者。机会的数量总是比想要利用机会的人少，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 五、数理模型分析

根据前两节的分析，初次分配受资源禀赋和分配机制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资源禀赋的差异可能表现为拥有何种要素以及每一种要素中所包含的知识或技术含量。在一个数理模型中，我们无法设置如此众多的变量。注意到资源禀赋的差异最终都表现为边际产出能力差异，所以本节仍借用传统分析方法中的“资本 + 劳动”两要素模型，识别代表边际产出能力的参数，并通过博弈结构反映不同的分配机制。

为了突出资源禀赋（边际产出能力）单一因素的影响，本节首先构建一个完全竞争要素市场模型（模型一）。在该模型中分配机制是中性的，不影响各方的讨价还价力，各方的收入份额仅取决于要素禀赋。

接下来，本节构建一个资方作为契约发起人的模型（模型二）和一个资方与工会谈判的模型（模型三）。当资方作为契约发起人时，资方提议一个工资水平，劳动要素所有者根据工资水平决定是否就业；在资方与工会谈判模型中，资方失去了提议工资水平的权力，劳动者以有组织的方式平等地与资方谈判。模型二将证明，当资方拥有统一行动能力而劳方分散行动时，全体劳动者所得份额少于完全竞争要素市场。模型三将证明，如果劳动要素所有者以统一组织的方式与资方谈判，其所得份额将会高于分散决策的情形。至于工会参与能否实现完全竞争要素市场的分配比例，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借助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分析。

### （一）模型一：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

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市场理论代表了完全竞争的情形。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任何企业都是要素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面对给定的价格选择各种要素的使用数量。既定的价格和企业自主决定的要素数量结合起来就决定了每一种要素的收入，也就是说，初次分配是通过企业的要素数量决策实现的。<sup>①</sup>

假设生产函数为  $y = L^\alpha K^{1-\alpha}$ ，其中  $L$  为劳动投入量， $K$  为资本投入量。 $\alpha$  和  $1-\alpha$  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根据定义，它们反映了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即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能力。面对给定的劳动价格和资本价格，企业选择  $L$  和  $K$  以最大化利润  $\pi$ 。假设企业产品的价格为 1，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分别为  $w$  和  $r$ ，则

$$\pi = L^\alpha K^{1-\alpha} - wL - rK \quad (1)$$

企业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text{Max}_{L, K} (L^\alpha K^{1-\alpha} - wL - rK) \quad (2)$$

根据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wL = \alpha L^{\alpha-1} K^{1-\alpha} \quad (3)$$

$$rK = (1-\alpha) L^\alpha K^{-\alpha} \quad (4)$$

在（3）（4）两式中，等号左边分别为劳动和资本要素所得，右边的  $L^\alpha K^{1-\alpha}$  是最优条件下的总产出。这

① Cowell, F. 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Elgar Handbook of Socio-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8, pp. 241–262.

一结果表明,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中,劳动和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  $\alpha$  和  $1-\alpha$ ,即要素的禀赋特点(边际产出能力)决定了其初次分配的份额,或者说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中各种要素按其贡献大小进行初次分配。

## (二) 模型二: 资方作为契约发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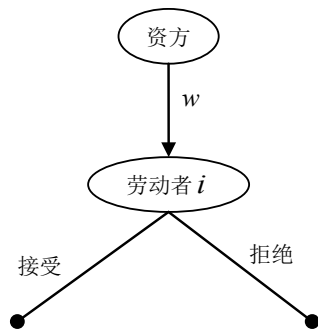
现实中的企业契约总是由某种要素所有者发起订立的。这个发起者因企业形式而异,但无论是哪种要素所有者发起企业契约,其共同特点都是占据统一行动的优势,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则处于分散行动的状态,这里我们要阐释的是发起者是如何利用其统一行动的力量在初次分配中获得好处。因此,下文仍选取最直观并且现实中存在的例子——古典企业(资方作为契约发起者)来展开分析。

资方拥有资本  $K$ , 劳方是由个体  $i$  构成的集合  $[0, 1]$ , 由于个人所拥有的存量财富、社会支持系统(血缘、社群、朋友)、政府保障不同,不同个体在失业情况下所能享有的生活保障是不同的,个体  $i$  在失业情况下所能获得的生活保障  $r_i$  平均分布在  $[0, R]$  区间,分布概率密度为  $f(r) = 1/R$ 。当个体  $i$  面对一个工资为  $w$  的工作机会时,如果  $w > r_i$ , 该个体将选择就业,反之,他将拒绝接受这个工作机会。于是,在给定的工资水平  $w$  下,就业水平将是

$$\int_0^w \frac{1}{R} dr = w/R \quad (5)$$

劳资博弈的过程如下(图2): 资方提议一个工资水平  $w$ , 劳动者非联合地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工资, 如果  $i$  接受, 则参与资方组织的生产活动, 并获得工资  $w$ ; 如果  $i$  不接受则只能依靠生活保障  $r_i$  生存。

图2 资方作为契约发起者的工资博弈



根据(5)式,对应于工资  $w$ , 资方获得的劳动力数量为  $w/R$ , 预计到  $w$  会影响劳动供给数量, 资方的决策是选择  $w$  以最大化其自身利润, 即

$$\text{Max}_w \left[ \left( \frac{w}{R} \right)^\alpha K^{1-\alpha} - \frac{w^2}{R} \right] \quad (6)$$

根据该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解得

$$w^* = \left[ \frac{\alpha}{2} (RK)^{1-\alpha} \right]^{\frac{1}{2-\alpha}} \quad (7)$$

将(7)式代入到生产函数  $y = (w/R)^\alpha K^{1-\alpha}$  及劳动者收入公式  $w^2/R$ , 可计算出劳动者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为  $p_L^* = \alpha/2$ 。将这一结果与(3)式对比<sup>①</sup>可知, 在资方作为契约发起人, 劳方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 全体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低于完全竞争市场(即  $\alpha$ )。另外, (7)式还表明, 提高劳动者的保障水平  $R$ , 可以提高均衡状态下的工资水平  $w^*$ , 但不会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收入份额( $p_L^* = \alpha/2$ ), 因为高保障降低了就业规模。

## (三) 模型三: 有工会参与的劳资博弈模型

导致模型二中劳动所得份额低于完全竞争情形的原因在于工资是由契约发起者提议的, 而发起者的目

<sup>①</sup> 模型一没有像模型二一样考虑劳动者生活保障水平  $r_i$ , 似乎两个模型没有可比性。但实际上, 只要承认劳动供给量是关于工资的增函数, 即  $L = \lambda w$ , 模型二就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 这里  $\lambda = 1/R$ 。模型二这样构建, 是为了讨论保障水平对工资和劳动所得份额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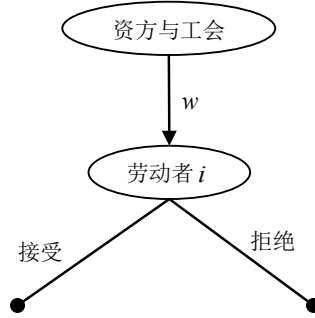
标函数是最大化自身效用。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的是工资的形成机制而不是原有机制中的一个或几个参数（例如社会保障）。基于上述考虑，下文构建一个工会代表全体劳动者与资方谈判的模型。

博弈的参与方除了模型二中的资方与劳动者个体外，还包括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博弈的过程如下（图3）：

- （1）资方与工会讨价还价以决定工资水平  $w$ ；
- （2）劳动者  $i$  决定是否接受工资  $w$ 。

假设资方与工会谈判的结果是  $w$ ，按模型二分析的结果，将有  $w/R$  的劳动者选择接受这个工资。

图3 有工会参与的劳资博弈



工会追求的目标是通过谈判使得全体劳动者效用最大化，具体可表示为谈判成功时的效用与谈判失败时的效用之差最大化。谈判成功时，满足  $r_i < w$  的劳动者将选择就业，这部分劳动者的数量为  $w/R$ ，他们的整体工资收入为  $w^2/R$ 。满足  $r_i \geq w$  的劳动者选择不就业，这部分人的平均生活保障水平为  $(R+w)/2$ ，数量为  $1-w/R$ ，通过社会保障获得的效用为  $(1-w/R)(R+w)/2$ 。所以，在谈判成功时工会的效用为  $w^2/R + (1-w/R)(R+w)/2$ ；谈判失败时，全体劳动者将依靠社会保障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数量已标准化为1），其保障总量为  $R/2$ 。基于上述分析，工会的目标函数为  $w^2/R + (1-w/R)(R+w)/2 - R/2 = w^2/2R$ 。

资方追求的目标是其自身在谈判成功与失败情况下的效用差最大化。谈判成功时，资方可以获得利润  $(w/R)^\alpha K^{1-\alpha} - w^2/R$ ，其中前一项为产品销售收入（价格标准化为1），后一项为工资成本。谈判失败时资方没有任何收益。因此，资方参与谈判时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w/R)^\alpha K^{1-\alpha} - w^2/R$ 。

除了谈判破裂点收益会影响谈判结果外，工会的讨价还价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引入工会讨价还价力参数  $\tau$  ( $0 \leq \tau \leq 1$ )。它是工会组织程度、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强度的函数。工会组织程度越高，政府越倾向于保护劳动者， $\tau$  值越大。基于以上假设，构建工会与资方谈判的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如下

$$\text{Max}_w \left[ \left( \frac{w}{R} \right)^\alpha K^{1-\alpha} - \frac{w^2}{R} \right]^{1-\tau} \left[ \frac{w^2}{2R} \right]^\tau \quad (8)$$

对（8）式中的目标函数取对数，然后再应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解得有工会参与时的工资谈判解为

$$w^{**} = \left[ \frac{(1-\tau)\alpha + 2\tau}{2} (RK)^{1-\alpha} \right]^{\frac{1}{2-\alpha}} \quad (9)$$

将（9）式代入到生产函数  $y = (w/R)^\alpha K^{1-\alpha}$  及劳动者收入公式  $w^2/R$ ，可计算出劳动者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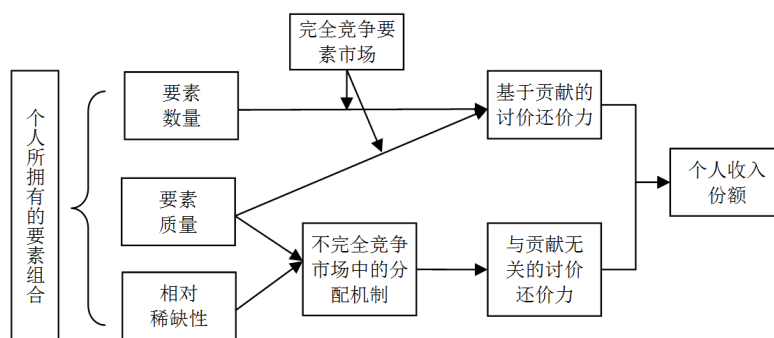
$$p_L^{**} = (1-\tau) \frac{\alpha}{2} + \tau \quad (10)$$

该式相当于模型二的解（ $p_L^* = \alpha/2$ ）与1的加权平均值，所以其值一定大于  $\alpha/2$ ，可见工会的参与提高了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这种份额的提高源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变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源自决定工资时所追求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化。当资方作为契约发起者时（模型二），工资水平决策的目标函数是资方的利润最大化；而当资方与工会共同讨论工资水平时，工资水平决策的目标函数变成了资方效用与劳方效用之积——纳什积最大化。

总结三、四和五节的阐释可以得出一个分析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图4）。个人可能拥有多种

生产要素，每一种要素又有数量、质量（边际产出能力）和相对稀缺性之别。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中，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形成了个人“基于贡献的讨价还价力”；离开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素质量和相对稀缺性将通过另外一个途径对分配过程产生影响，那就是它们将影响何种要素可以作为企业契约的发起者和分配机制设计者，这种权力的产生不是基于要素的贡献，而是基于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分配过程，所以本文称其为“与贡献无关的讨价还价力”。讨价还价力作为一个核心变量，不论其形成基础如何，都会对分配结果产生影响，是影响分配结果的直接变量。

图 4 初次分配的影响因素



## 六、数值模拟分析

因为资本要素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超过劳动要素，因而学者们通常建议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以缩小收入差距。<sup>①</sup>因为资本所有者作为契约发起人统一行动而劳动者分散决策的情况最为常见，于是推动劳动者组织工会并且加强工会的权力也基本成为学界的一致主张。对于上述主张的实际效果如何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这些主张，理论界实际上尚未做进一步的探究。本节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提供一些不同于直觉的洞见。

### （一）要素的人际分布以及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

借鉴道迪和加西亚-佩纳罗萨（Daudey & Garcia-Penalosa）的理论模型，<sup>②</sup>下文考虑一个两种生产要素的经济体<sup>③</sup>。在该经济体中参与生产（投入劳动或资本）的总人口数为  $P$ ，人均劳动时间为 1；资本投入总量为  $K$ ，则社会总产出为  $Y=F(P, K)$ 。其中个体  $i$  劳动时间为  $L_i$ （满足  $\sum_{i=1}^P L_i/P=1$ ），工资率（劳动力质量）为  $w_i$ ，劳动收入  $W_i = w_i L_i$ 。个体  $i$  拥有的资本量为  $K_i$ （满足  $\sum_{i=1}^P K_i = K$ ）， $K_i$  是货币化了的资本，因此，资本的异质性体现在  $K_i$  的数值大小上。货币化后的资本的收益率应该是相同的，假设为  $r$ 。于是个体  $i$  的收入可以表示为

$$Y_i = W_i + rK_i \quad (11)$$

相对收入（绝对收入  $Y_i$  与社会平均收入  $Y/P$  之比）为

$$y_i = \frac{W_i + rK_i}{Y/P} = \frac{\bar{W}P}{Y} \frac{W_i}{\bar{W}} + \frac{r\bar{K}P}{Y} \frac{K_i}{\bar{K}} = S_L \omega_i + (1 - S_L) k_i \quad (12)$$

其中， $\bar{W}$  为人均劳动收入， $S_L = \bar{W}P/Y$  为社会总产出中劳动要素所占份额， $\omega_i = W_i/\bar{W}$  为个体  $i$  的相对的劳动收入， $\bar{K}$  为人均资本拥有量， $k_i = K_i/\bar{K}$  为个体  $i$  的相对资本拥有量。

财富或资源分布最常见的规律是帕累托分布  $[f(x) = \alpha \cdot x_m^\alpha / x^{\alpha+1}]$ ，其中  $x_m$  为随机变量  $x$  的最小值， $\alpha$  为不

① Lerman, R.I., Yitzhaki, S.,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by Income Source: A New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1), pp. 151—156.

② Daudey, E., Garcia-Penalosa, C.,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43(5), pp. 812—829.

③ 道迪和加西亚-佩纳罗萨的模型假设每个生产参与者贡献 1 单位时间的劳动，本文略有不同，假设各个生产参与者可以贡献不同数量的劳动  $L_i$ ，且  $L_i$  可以为零。

平等程度,  $\alpha$  越大越不平等], 即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富或最优势的资源。这种现象并非是社会处于非正常阶段的特例, 而是有着稳定的经济过程基础,<sup>①</sup> 因此可以假设, 政策干预能够影响的是不平等程度  $\alpha$  而非分布模式本身。本文将这一假设做为数值模拟的逻辑起点。

假设个人劳动收入  $W_i$  (个人劳动质量和数量的综合表征) 服从参数为  $W_m$  (劳动收入最小值) 和  $\alpha$  ( $\alpha > 1$ ) 的帕累托分布, 即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f(W) = \begin{cases} \alpha W_m^\alpha / W^{\alpha+1} & W \geq W_m \\ 0 & W < W_m \end{cases}$$

期望值为  $E(W_i) = \alpha W_m / (\alpha - 1)$ ;

假设个人资本拥有量  $K_i$  服从参数为  $K_m$  (最低资本) 和  $\beta$  ( $\beta > 1$ ) 的帕累托分布, 即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f(K) = \begin{cases} \beta K_m^\beta / K^{\beta+1} & K \geq K_m \\ 0 & K < K_m \end{cases}$$

期望值为  $E(K_i) = \beta K_m / (\beta - 1)$ 。

根据随机变量的函数的概率分布原理, 相对劳动收入  $\omega_i = W_i / E(W_i)$  服从参数为  $(\alpha - 1) / \alpha$  (最低相对劳动收入) 和  $\alpha$  的帕累托分配, 其概率密度为

$$f(\omega) = \begin{cases} [(\alpha - 1) / \alpha]^\alpha \alpha / \omega^{\alpha+1} & \omega \geq (\alpha - 1) / \alpha \\ 0 & \omega < (\alpha - 1) / \alpha \end{cases} \quad (13)$$

相对资本  $k_i = K_i / E(K_i)$  服从参数为  $(\beta - 1) / \beta$  (最低相对资本) 和  $\beta$  的帕累托分配, 其概率密度为

$$f(k) = \begin{cases} [(\beta - 1) / \beta]^\beta \beta / k^{\beta+1} & k \geq (\beta - 1) / \beta \\ 0 & k < (\beta - 1) / \beta \end{cases} \quad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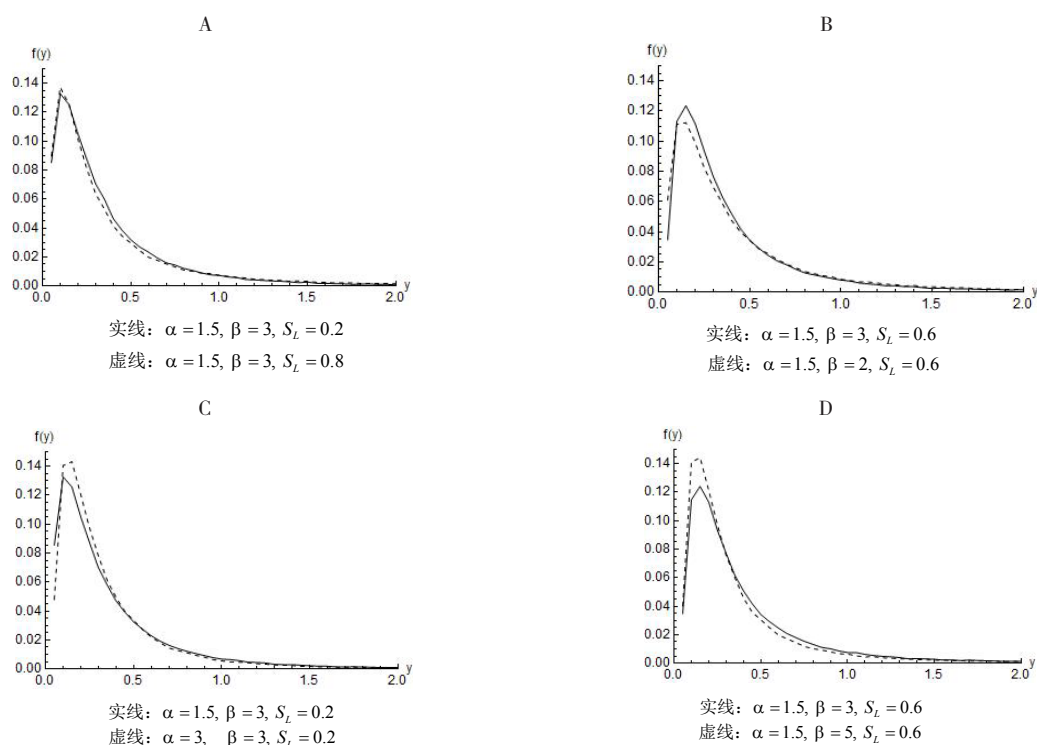
数值模拟的操作过程如下: 首先用 Mathematica 软件生成符合帕累托分布的伪随机数  $\omega$  和  $k$ , 用它们代表个人的相对劳动收入  $\omega_i$  和相对资本拥有量  $k_i$ , 然后将  $\omega_i$  和  $k_i$  代入 (12) 式计算个人的相对收入  $y_i$ , 统计  $y_i$  的频率分布以近似地反映其概率密度曲线。分析要素收入份额  $S_L$  和  $1 - S_L$ 、个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alpha$ 、资本拥有量的不平等程度  $\beta$  对概率密度曲线形状的影响, 就可以揭示这些因素对个人全要素 (来源于劳动和资本) 收入  $y_i$  的影响, 从而显示各种政策干预的效果。

图 5 是按上述方法模拟 10 万个个体全要素收入的概率密度曲线。通过对比分析这些曲线,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多元化的要素收入可以形成“非对称钟形”收入分布模式。帕累托分布本身的概率密度曲线是极端不对称的, 形状类似于图 5 中某条钟形曲线最高点的右半部分。本文假设单一生产要素 ( $\omega_i$  或  $k_i$ ) 的分布符合帕累托分布, 模拟结果 (图 5 中的 4 条实线和 4 条虚线) 显示, 当个体的收入来源于多种要素时, 其总收入分布不再是帕累托型的, 而是一个“非对称钟形”的概率密度曲线。称其为“非对称钟形”是因为曲线的最高点并不对应于平均水平 ( $y=1$ ) 而是位于其左侧, 也就是说最众数的收入水平并不对应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是低于平均水平。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高收入者的人数虽少但收入水平极高, 因而抬升了社会整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单一要素符合帕累托分布的前提下, 期望“对称钟形”收入分布模式是不切实际的, 但通过干预生产要素人际分布的参数 ( $\alpha$  和  $\beta$ ) 以及要素收入份额 ( $S_L$  和  $1 - S_L$ ) 可以让“非对称钟形”的尽量接近“对称钟形”, 或者说尽量减小概率密度曲线下方位于直线  $y=1$  左侧部分的面积。

第二, 增加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学者们大多主张增加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以缩小收入差距, 理由是既然劳动要素的人际分布比资本要素更平等, 那么增加平等分布的要素的收入份额理应会增加最终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然而, 数值模拟的结果并不如猜想的那样显著。图 5A 对应于  $\alpha=1.5$ 、 $\beta=3$  的参数组合, 表示劳动要素 (数量和质量) 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资本

<sup>①</sup> Jones, C. I. “Pareto and Piketty: The Macroeconomics of Top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29(1), pp. 29—46.

图 5 模拟的个人全要素收入  $y_i$  概率密度曲线

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但当我们把劳动份额  $S_L$  从 0.2 (对应于图中的实线) 提升到 0.8 时 (对应于图中的虚线),低收入群体的比例 (相当于曲线下方  $y=1$  左侧部分的面积) 仅有轻微的减小。这种“不合意”的模拟结果其实在逻辑上是真正合理的。从  $\alpha=1.5, \beta=3$  的参数组合可以看出,导致个人收入  $y_i$  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分布不平等,而提升劳动的收入份额  $S_L$  相当于用一个中性的驱动因素去中和一个极端的驱动因素,其矫正效果必然有限。理论上,只有当  $S_L$  无限接近于 1 时,  $y_i$  的分布才会接近劳动要素分布的平等程度,而劳动要素分布本身无论多么平等都仍然是帕累托型的。

调整收入政策的切入点可以收获明显的效果。在图 5B 中,实线所对应的要素分布情况仍然与图 5A 相同 ( $\alpha=1.5, \beta=3$ ),虚线代表降低了资本分布不平等程度 ( $\beta$  降为 2) 后的情况,我们看到低收入群体的比例 (虚线下方  $y=1$  左侧部分的面积) 显著减小。为了排除资本要素收入占比 (即  $1-S_L$ ) 较高可能带来的影响,该模拟有意将  $1-S_L$  设置为 0.4 (较小)。该模拟结果可以表述为:当资本要素的人际分布差距明显高于劳动要素时,即使资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较小,减小资本要素人际分布差距仍然能显著地缩小全要素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增加某种要素人际分布的不平等程度 ( $\alpha$  或  $\beta$ ) 会显著加大全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即使该种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 ( $S_L$  和  $1-S_L$ ) 较小。图 5C 模拟了增加劳动要素人际分布不平等程度的后果。实线代表初始的情况  $\alpha=1.5, \beta=3$ ,相对而言劳动要素的人际分布比资本更平等一些。当我们将  $\alpha$  从 1.5 提高到 3 时 (虚线),低收入群体的比例明显增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该模拟设定的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很低 ( $S_L=0.2$ );图 5D 模拟了增加资本要素人际分布不平等程度的后果。实线代表初始的情况  $\alpha=1.5, \beta=3$ 。当我们将  $\beta$  从 3 进一步提高到 5 时 (虚线),低收入群体的比例明显增加。需要强调的是,该模拟设定的资本要素份额并不高 ( $1-S_L=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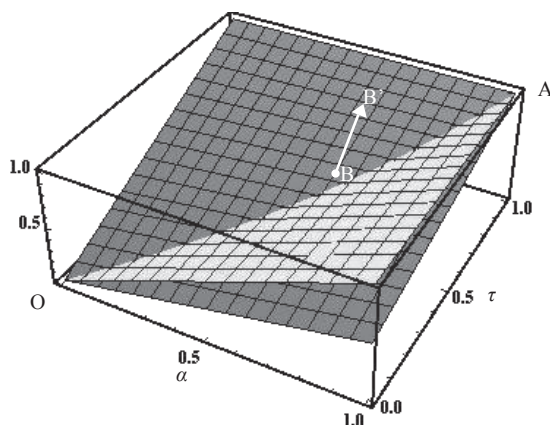
从上述三个发现似乎可以归纳出更为概括的认识:(1) 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可以修正单一要素人际分布的帕累托属性,从而实现“非对称钟形”的收入分配结构;(2) 在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前提下,要素收入份额 ( $S_L$  和  $1-S_L$ ) 对个人收入 ( $y_i$ ) 的影响小于要素分布不平等程度 ( $\alpha$  和  $\beta$ ) 的影响。

## （二）工会讨价还价力的最优水平

在有工会参与的劳资博弈模型中，劳动占总产出的份额将高于资方发起企业契约的情形（见 10 式）。(10) 式对  $\tau$  求导得  $dp_L^*/d\tau = (1-\alpha)/2 > 0$ ，说明劳动所得份额随着工会讨价还价力的增加而增加。这种份额的增大与要素贡献无关（求偏导时假设  $\alpha$  不变），它完全来自工会的讨价还价力。这就可能导致一种后果，即劳动要素所有者不是通过提升自身的边际产出能力（如学习、培训）追求更高的收入，而是组织强大的工会，通过影响法律法规来提升自身的讨价还价力进而提升所得份额。由此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工会的讨价还价力应该多大才是最优水平。

图 6 绘制了有工会参与时劳动所得份额随其边际产出  $\alpha$  和工会讨价还价力  $\tau$  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深色曲面），以及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中劳动所得份额随其边际产出  $\alpha$  的变化情况（浅色曲面）。在两个曲面的交线 OA 上，两种情形下劳动所得份额相同，可以称之为“有效率的工会权力曲线”，因为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代表了一种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该曲线表明，随着劳动的边际产出能力  $\alpha$  增加，为了实现与完全竞争要素市场相同的分配结果，工会的讨价还价力要相应增加。但是，如果工会讨价还价力的增加偏离了该曲线（例如从 B 点到 B' 点），劳动所得份额将超出完全竞争要素市场的水平。

图 6 劳动所得份额与其边际产出弹性及工会权力的关系



浅色曲面：完全竞争要素市场， $p_L = \alpha$

深色曲面：有工会参与的情形， $p_L = (1-\tau)\alpha/2 + \tau$

## 七、缩小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途径

已有的收入分配理论可以归纳为要素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两个流派。<sup>①</sup> 要素收入分配流派主要考察国民收入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基于劳动所得份额低于资本所得份额的统计事实，该流派认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提升劳动在初次分配的份额。但是，要素种类与个人（或家庭）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家庭可能既有劳动能力又有物质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政策将会使哪些人受益仍是不明确的；个人收入分配流派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来计量收入差距，并试图用教育水平、性别、行业或地区等人口学变量来解释收入差距。这种人口学解释使得经济理论无从插手，收入调节政策变成了地区扶贫、反性别歧视、最低工资等近似直接的干预，难免有头痛医头之嫌。

一个可行的逻辑框架是将两个流派结合起来——以个人或家庭收入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个人或家庭的要素特征（要素组合、每种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相对稀缺性）和所处的分配体制找出造成差距的原因，进而从要素禀赋和分配机制角度给出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 （一）丰富低收入者的要素组合

受资源稀缺性的限制，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总会有某些生产要素处于相对稀缺地位，表现出较高的

① 周明海、姚先国、肖文：《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进展和未来方向》，《世界经济文汇》2012年第3期。

边际产出能力（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其所有者也容易成为企业契约的发起人，而成为初次分配博弈中的强者。以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例，资本仍是相对稀缺的要素，<sup>①</sup>这意味着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个人或家庭将处于劣势地位。当前流行的观点是通过政府规制强行提高工资水平和资本利得税，<sup>②</sup>但这样做的弊端已经显现，那就是提高了企业成本、逼迫资本向低工资国家流动。要素收入分配理论隐含地假定个人或家庭要么属于劳动要素所有者，要么属于资本要素所有者，因而将个人收入不平等完全归咎于要素收入不平等。实际上要素收入不平等仅仅反映了不同要素在合作生产中的地位，是要素收入不平等和个人要素组合不合理两个方面加起来才导致了个人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这一洞见为我们打开了调节初次分配的另一条途径，那就是尝试改变个人所拥有的要素组合。

仍以中国当前阶段的初次分配格局为例，那些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大部分是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和城镇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除了提供最初级的劳动外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带来收入。这里所说的没有其他资源仅仅是相对于目前的经济体制而言。实际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度里，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生产要素，而是那些生产要素不能为他们带来收入。最明显的例子当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名义上人人有份，但在实现要素收入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如果能真正实现农民对土地的完全产权或长期使用权及使用权的转让权，他们的生产要素组合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再看城镇低收入人口，表面上看他们既没有土地又没有金融资本，但实际上作为国有资产的主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从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中获得分红。目前之所以不能实现这部分收入，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利润被代理人主要以扩大再生产为理由直接截留了。

另外，即便是那些拥有高级技能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也很难说是对其要素的全部报酬。为了获得技术或管理技能，这些劳动者要先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与物质资本所有者投资建厂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劳动者同样面临着失业和部分技能失效的风险，这与物质资本所承担的贬值风险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但是，目前的报酬体系却是按劳动时间付酬而非按人力资本分红。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采取不同的回报方式，实际上是忽略了人力资本的先期投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按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计价入股。

## （二）提升要素质量和边际产出能力

在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中，要素所得份额完全由其边际产出能力决定。即使是在非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中，要素的边际产出能力仍是影响其所得份额的基础性因素 [ 见模型二  $p_L^* = \alpha/2$  和模型三  $p_L^{**} = (1-\tau)\alpha/2+\tau$  ]，因此无论是否存在其他手段，提高低收入者所拥有要素的边际产出能力不失为一种基础性的措施。

技术进步使得物质资本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种变化导致两个后果：一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越来越强，二是在需要劳动要素的生产场合所需要的也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能够操作复杂设备，掌握先进工艺方法的技能型劳动。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得那些只有体力没有技能的劳动者变得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在初次分配中失去了讨价还价能力。

随着分工的细化和经济全球化，企业的经营过程和管理方法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工作从早期的企业主亲自管理过渡到职业经理人管理再过渡到多层级的管理系统，管理者正在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进入经济社会。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活动对劳动者的需求不再是仅仅需要其体力，而是需要其分析、预测、计划、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这一变化趋势也使得那些只有体力资源，缺乏智力资源的劳动者的价值越来越低。

总之，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正在使简单劳动要素所有者成为初次分配中的弱势群体。如果想要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迫切需要改造初级劳动要素，提升劳动要素的质量。

① 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赵振华：《关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的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刘长庚、许明、刘一蓓：《员工获得了“公平”的劳动所得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测度与验证》，《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1期。

② 高凌江、雷雄：《基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国税收演变轨迹及对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3期。

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主要传授作为当代社会成员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培养人的价值观、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而职业教育主要传授从事专门职业的知识和技能。普通教育虽然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能为职业教育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但真正能够提升劳动力产出能力，使其适应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教育形式是职业教育。人类知识的加速积累使得基础教育越来越不堪重负，也就是说无论基础教育的时间如何延长都无法让受教育者哪怕是对全部人类知识作一个概略的了解。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细化，职业的种类越来越多，每一种职业对基础教育的要求都是不同的，或者说仅仅需要人类通识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在这种趋势下，一个可行的教育改革方向是缩短基础教育时间，尽早根据受教育者的发展志向分化基础知识教学，为日后的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奠定基础，保证受教育者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职业教育。例如在德国，不分对象的所谓纯粹基础教育只有四年时间（相当于小学阶段），学生在五到九年级就会分流进入不同类型的中学，结合日后的发展方向（例如是考职业学校还是考大学）有针对性地学习基础知识。从全部受教育者的未来去向看，真正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的人仅占很小比例，因此，教育体系的设计不应瞄准“最高”发展可能而应瞄准“最多”发展可能。

一般认为基础教育属于公共服务，而职业教育是受教育者为将来就业所进行的个人投资，因此政府仅仅应该为基础教育付费。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年限很长的国家，例如中国，政府已经为冗长的教育过程承担了大量的财政负担，就更理所当然地不再承担职业教育阶段的费用。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政府解决初次分配问题的一种手段，那么国家在缩短基础教育年限的前提下承担职业教育阶段的费用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既然可以用公共财政救济或培训失业者，为什么不可以在其学习阶段花些钱以利于他们日后择业？

职业教育需要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训相结合。通常认为，学校的社会功能就是教育，因此理应承担起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即使需要与企业合作，那也应该由学校主动发起。但是，这种体制安排存在着动机冲突——职业学校为了完成教育职能，有动力去主动寻求与企业合作，但企业却将这一过程视为额外的负担，毕竟实习学生不能代替合格的技术工人，企业也不总是从实习生中补充工人。实际上，职业教育应该成为企业的一项合规业务，政府应当给予企业与职业学校同等的开展职业教育业务的政策。

### （三）对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行干预

前面几节的分析表明，当存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时，各种要素的所得份额正好等于其贡献份额。在这种情况下，调节初次分配的切入点是提升弱势群体的要素产出能力、改善个人所拥有的要素组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要素市场非完全竞争是一种常态，或者说收入分配机制中的权力不对等现象总是存在的。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的措施应该包括对分配机制本身的干预。

当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契约发起人时，劳动要素处于分散行动的状态。个体劳动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到与资方对等谈判。只有将单个的劳动者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对资方形成制约。为了实现这种效应，工会的相对独立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工会组织本身不能受制于企业（例如，工会领导人同时又是企业高管，受董事会制约）。欧美国家实行行业工会制度，因而其工会力量十分强大；日本实行企业工会制度，因而日本的工会在工资谈判中作用很小。需要说明的是，工会的力量并非是越大越好，模型三的数理分析表明，当工会的讨价还价力过于强大时，劳动所得份额将会超过其贡献比例，从而削弱资本要素的投入积极性。因此，政府干预劳资谈判的基本准则是让工会的力量与劳动要素的产出能力相当。

当企业家（管理要素所有者）作为企业契约的发起人时，资本所有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一般劳动者处于分散行动的状态。如何确保中小投资者和普通劳动者在分配机制中的讨价还价力应该是政府干预的重点。流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强调给予企业家股权或期权激励，从而解决两权分离的矛盾，这种机制非但没有加强中小投资人和普通劳动者的权力，反而赋予了强势群体更多的分配权力。改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出路不在于如何讨好职业经理人，而在于如何提高中小投资者和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

当技术发明人作为生产契约的发起人时（创新创业型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劳动要素所有者处于分

散行动的状态。技术发明因其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从而为虚假的发明和上市套现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这不是说所有的发明和创业行为都是投机的,而是说政府需要完善风险投资和创新创业融资市场的管理机制,让各方获得对等的讨价还价力。

[ 本文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名家自由探索计划项目“政治、经济与财富分配理论研究”(2015FRMJ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权力范式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15JJD79001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权力与内生制度变迁的动态均衡研究”(16YJC79009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敏)

## 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n Primary Distribution

DU Yushen, ZHANG Yishan, WANG Guangliang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residents' incom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implementing the secondary distribution policy on a large scale. As medium-to-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a new normal and the growth rate of government revenue continues to decl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ary distribution policy will be constrained. It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how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in the field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argue,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y, that personal income depends on their portfolio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share of each factor i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The share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scarcity of factors and the mechanism of initiating the enterprise contract. Analytical models supports the abo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further shows that diversified sources of income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n olive-like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l.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labor factor is less effective in narrowing the income inequality than reducing inequality in factor endowments.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 proposes a policy suggestion of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gainst the current primary distribution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primary distribution, factor endowmen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bargaining, income inequality